

学林

论衡

凭海相通

葛兆光

明清时代,是东亚海域逐渐纳入全球史的时代。

过去,我们常常说东亚/东了了/ East Asian,或者“东亚海域”。但是,在过去的中日韩学术界,所谓“东亚”常常只是东北亚(比如韩国就有东北亚财团)、“东亚海域”常常只是“环东海海域”,并不包括东南亚或者“环南海海域”,最多因为西端定生“汉字文化圈”或“儒家文化圈”的说法,把琉球、越南算进来。但这显然有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潜意识。

事实上,明代以后的东北亚和东南亚,也就是东海和南海海域,几乎是连成一片的,北起鄂尔孜克海日本海,南到爪哇、帝汶(看塞里登地图可以明白),互相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很密切,长崎、琉球、月港、马尼拉、马六甲、巴达维亚,已经把东海、南海连成一片,一直到清代也一样。“东亚海域”在明清时期,已是一个相对自足的历史世界。可以注意到,严格意义上明清中国的册封国都来自这片区域(《大明会典》和《大清会典》的记载,主要是朝鲜、琉球、安南、苏禄、缅甸、南掌、暹罗),而最繁荣的海上贸易,也是来自这片地区(清代施琅和姜宸英都说,只要一开禁,海上商船就会遮于占城、暹罗、真腊、满刺加、渤泥、荷兰、吕宋、日本、苏禄、琉球)。

过去的交通靠车马骆驼,所以就地叫“舆地图”,舆就是车。可是海上的交通靠舟楫。2015年我在日本东京大学发现一幅《大明地理之图》,在海上就特别画了朝鲜、日本以及荷兰人的四艘船。而东海、南海,以及通过马六甲到印度洋,然后连到欧亚非的大海之间,并没有尔疆我界,东北亚和东南亚之间也因此联系密切。明代经济上更加依赖东南面向海洋。此时起,欧洲的传教士、商人包括殖民者,再不像马可·波罗那样,经由欧亚大陆而来,你想一想十七世纪初葡萄牙人鄂本笃从印度经西域到中国是多么艰难,就可以知道这种变化了。这时候,欧洲人留在孤独越发达的纽约。自1947年离开巴勒斯坦,时隔四十五年,他首次能够重返故土,让妻子玛利安姆、女儿娜杰拉和儿子瓦迪看看自己出生的地方。

后殖民理论读手册里,会提到萨义德、霍米·巴巴、斯皮瓦克是后殖民理论的“圣三位一体”;说到殖民时期和后殖民时期的划分,与康纳·克鲁兹·奥布莱恩、匈牙利裔美国历史学家约翰·卢卡奇谈的萨义德坦言“我觉得这个‘后’字加得没什么用”,因为对他来说,那并没有成为过去。

举个例子我感受很深的例子,就是观音菩萨像。古代中国观音菩萨信仰流传最广,水月观音、千手千眼观音、鱼篮观音,观世音菩萨像,到处都是。从官崎市定以来的学者也注意到,它不仅从印度过来,逐渐男身变女身,也从中国到欧洲,影响到圣母玛利亚的形象,还通过福建德化窑白瓷观音像传到日本,在长崎代替佛教时期的圣母像,表达坚定的天主教信仰。2015年,我还在巴黎吉美博物馆里,看到一尊梳着蒙古女性高髻的元代观音像。它化身万千,在不同区域,以不同的样式,承担着不同的象征,把各地的宗教文化联系起来。

尽管很多人说,蒙古时代是世界史的开端,但是我想说,那不是陆地的世界,从海洋上看,东亚海域成为一个历史世界,是从明清开始的,全球成为一个历史,也是从十五世纪开始的。

(作者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教授)

成为符号前的萨义德

伽禾

编者按

今年是巴勒斯坦阿拉伯裔美国学者爱德华·萨义德(1935—2003)逝世二十周年。萨义德的父亲1947年从耶路撒冷移民至开罗,四年后,萨义德赴美留学。他擅长从社会与文化政治视角审视文学,而语言和文学研究也一直是他的武器。1978年,后来被视为二十世纪学术名著的《东方学》出版。萨义德在书中指出早期西方人文学术中对“东方”(他尤指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充满偏见,“东方学”是一种学术研究学科、一种思维方式与一种权力话语方式;西方学者以“他者”眼光看待东方,形成了一种刻板化的错误认知,从而助推、支持了西方的殖民政策。“9·11”事件发生后,萨义德驳斥“文明冲突论”,认为其源于西方的东方学传统。

曾经,萨义德“凭借自己的人格力量,使文学和社会批评成为下一代每个有进取心的学生都想践行的和拥有的东西”(蒂莫西·布伦南)。若干年后,在急速变化的世界,他已成为一个符号,和“东方主义”“他者”“后殖民”这些学术名词绑定在一起。他发明的概念和他所代表的人文主义传统是否仍然有效?让我们一起重探他的来路。

今日以思想家、文学评论家乃至古典音乐评论家著称的爱德华·萨义德实则有两次认真地考虑创作长篇小说。一次是1962年夏天在布鲁特创作《挽歌》(Elegy),试图还原四十年代的埃及开罗,留存至今的片段读着依然令人印象深刻。

今天和往常一样,穆菲德一直待在多尘而又闷热的小办公室里,椅子远离桌子,身体前倾,手肘支着膝盖,双手撑着下巴,嘴角叼着烟,盯着墨迹斑斑的地板。桌子上巨大的账本是他无法认真对待的东西,他沉思着,觉得那些赤裸裸的小数字——他自己的——有点儿可笑,它们自信地铺满一页又一页的账本。对他来说,只有在整洁的状态下,数字才是真实的。这是他讲究整洁的成就:上司想看的销售、利润和损失统计,穆菲德一窍不通。他忙于其他事情,那些他人一窍不通的事情。

1957年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后,萨义德并没有直接进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而是回开罗待了一年,他想去无旁骛地弹钢琴,虽然职业钢琴家这条路已经行不通。这一年里,他每天早上八点开车到父亲瓦迪的标准文具公司,却派不到任何具体工作。到了月底,他必须和其他员工一起排队领取两百埃及镑的薪水,回到家,瓦迪会客气地请儿子返还这笔钱,“事关资金流动”。

无法隐藏

上面引述的小说片段显然来源于1957—1958年萨义德在开罗的经历,穆菲德“觉得那些赤裸裸的小数字有点儿可笑”,让人联想起近四十年后,回忆录《格格不入》里写到父亲瓦迪问他什么时候能看懂资产负债表。如萨义德所料,四个妹妹读了他的回忆录感到愤愤不平——父母把最好的给了你,你却这样描述他们。然而,读者可以体会到《格格不入》着力塑造的心理真实,女儿们看到父母

对唯一的儿子大力栽培,而儿子记得并想记录的是那些沟通不畅的尴尬细节。

毕竟,1952年的埃及革命,1956年纳赛尔宣布苏伊士运河收回国有的第二次中东战争以及1982年的第五次中东战争,萨义德都是隔着遥远的距离,担忧家人的安危。《格格不入》收录一幅照片——儿时每年都在翠薇小镇消夏的度假屋被以色列的炮火洞穿。几次影响中东世界的巨变,萨义德都不在现场,但他自诩有照相机般的记忆,《格格不入》留存了已不复存在的阿拉伯世界。

事实上,萨义德的自我讲述与真实经历之间似相抵牾的证明,并非只有1999年才出版的回忆录;很多论者认为1967年之前,萨义德在高校教比较文学,与政治无涉,当作佐证的,就是萨义德自述,比如他写到创作《被画像的阿拉伯人》(1969)的由来:

[1948年之后]我说我来自黎巴嫩,这像沉默一样懦弱,因为它意味着不想说得挑衅的话。随着时间流逝,我获得了学位,我成了教授……在[1967年]6月那可怕的一周里,我并没有因此觉得好过些。我是一个阿拉伯人,我们——对我大多数觉得尴尬的友人来说,就是“你们”——在接受惩罚。我写了一两封主旨明确的信,投给《时代周刊》(没有刊载),和其他几个阿拉伯人一起定期讨论,实际就是集体治疗……怀着自怜感,我写了《被画像的阿拉伯人》。

这番自述显然不是想否认他对巴勒斯坦问题的一贯关切(1948年事件已迫使诸多亲戚好友背井离乡,关系甚好的纳比哈姑姑有“巴勒斯坦母亲”之称,在开罗的政府机构和慈善团体间持续奔走,说服它们协力救助难民——萨义德都看在眼里),而毋宁说是在反省,也意味着必须正视双重身份带来的挤压感,自己阿拉伯的一面已无法继续隐藏。

当我刚开始在哥大教书的时候(按:1963年)……我就像两个人……教文学的老师和……另一个人,如道连·格雷,做着难以用言语表达也说不出口的事情……我和莱昂内尔·特里林关系很不错……可是在十五年里,我们从来没有一次把另外那些话题摆到台面上说;我训练自己适应这样的生活。

这段话来自萨义德与英国文化研究先驱雷蒙·威廉斯的对话,以《媒体、边缘和现代性》为题收录在威廉斯在1989年(即他去世一年后)出版的《现代主义的政治:反抗新教派》附录中。两人见面次数有限,萨义德却能倾吐心里话,而更为常人所忽略的是,论萨义德所著《东方学》获得的思辨启发来源,雷蒙·威廉斯远大于迈克尔·福柯。

从翻译再解《登幽州台歌》

顾钧

歌》正作于此。当时陈子昂的提议屡为“谢绝”,还被降职,当他登上燕台,燕昭王礼遇郭隼、乐毅的往事自然会浮现在眼前,让他无比感慨。

有趣的是,有些译者放弃了“登幽州台歌”的字面意思,选择了灵活的意译策略。比如白英采用了《The Ancients》(古人),既凸显了该诗的怀古主题,也很好地对了首句中的“前不见古人”,但问题在于无法照顾到“来者”。

一般的怀古诗都是只讲古人,以古喻今,很少谈到未来。陈子昂写《登幽州台歌》的几乎同时还创作了另几首诗,其中最著名的即为《燕昭王》:“南登碣石

馆,遥望黄金台。丘陵尽乔木,昭王安在哉?霸图今已矣,驱马复归来。”这里只有早已成为“古人”的昭王以及他留下的遗迹——黄金台即幽州台。从这个意义上说,《登幽州台歌》中的“前不见古人”值得高度关注,陈子昂不只追念过去,也在思考未来,比一般的怀古诗更开阔。实际上,他的视野不仅涵盖时间(前、后),从第三句“念天地之悠悠”来看,也涵盖空间。时空即宇宙。李德胜便将该诗题目译为Gazing into Distance,别具匠心。Distance既可以指空间的距离,也可以表明时间的遥远。《燕昭王》着力于古事古迹之叙写,而《登幽州台歌》则更为

这恰恰是他与话语理论、符号学分析等系统性理论的根本区别。系统性理论的危险之处,可参照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对十八世纪修辞学家、罗马法学家詹巴蒂斯塔·维柯的引述:

以将知识对象作纯粹的形式概念提炼、数学组织和自然法则的理想为代表的知识典范,都越来越多地将知识转化为对形式联系进行系统性、有意识的思考,这些“规律”在现实中起作用,客观的作用,不需要主体的干预。

难怪萨义德在越南战争结束不久的七十年代末,便敏锐觉察到彼时“美国的文学理论已从跨越各种专业边界的大胆干预活动退身进入‘文本性’的迷宫”,这种趋势在八十年代愈发壮大,与里根政府倡导的新自由主义形成合谋,“世俗批评”针对的就是这种转向。

借二战期间流亡土耳其的德国犹太学者埃里希·奥尔巴赫创作《摹仿论》的经历,萨义德发展出血缘关系(filiation)和附属关系(affiliation)的阐述。正因为流亡土耳其,身边缺乏藏书丰富的专业图书馆,奥尔巴赫勇于提笔写一个“野心大得荒唐可笑”的题目(西方文学的现实再现),《摹仿论》至今仍是一部经典,奥尔巴赫将与根基斩断的流亡变为完成一项独特使命的契机。作为最后一代博学的历史语文学家的代表人物,奥尔巴赫当然相信欧洲文化对于人类历史有着无可置疑的中心地位。由此生成的文化附属关系推理下去,“但凡我们的便是好的”“出现了从诺斯罗普·弗莱到福柯不等的体系,都称拥有那种一劳永逸地、全面并有预言性地展示万物如何运作的权力”“这一新型附属关系结构及其思想体系或多或少都直接重新塑造出家族权威的架构”(《世俗批评》)。

观念与事件之间

《东方学》将文学纳入考察,遭正统东方学家白眼,这并不能阻碍萨义德在时隔十五年后出版的《文化与帝国主义》中依然历史性地看待文学。蒂莫西·布伦南所著《萨义德传》(2021,中译2023)发现了这一时空空壳:《文化与帝国主义》“捍卫剖析小说所揭示的相关历史上一阅读法”,正如萨义德在哈佛的博导哈里·列文三十年前所著《角之门》的文学批评实践。

《角之门》书名源自荷马史诗《奥德赛》第19节:

奇异的梦有两座大门可以穿过:一对取料硬角,另一对用象牙做成。

抽象,陈子昂从燕昭王的具体历史故事出发,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想到了古往今来的怀才不遇、生不逢时。

陈子昂凝视前后上下之后的反应是“怆然”,是痛苦,乃至“涕下”。翟理斯将《登幽州台歌》译为《Regrets》(失望),在所有译文中最为简洁明快,抓住了陈子昂写诗时的某种精神状态。

清人王夫之曾指出:“陈子昂以诗名于唐,非但文士之选,使得明君以尽其才,驾马周而颇颇姚崇,以为大臣可矣。”马周和姚崇是唐朝的著名宰相,陈子昂水平不在他们之下,只是没有得到真正的赏识和重用。华兹生认为陈子昂在此



▲ 巴伦博伊姆-萨义德学院,德国柏林
Volker Kreidler 摄



▲ 萨义德
Brigitte Lacombe 摄
均资料图片

象牙之门闪烁着微光的幻象穿过,从不会成真。那些能穿走坚固、抛光的角之门的梦景却会成为现实,倘若世人只晓得它们。

这部著作以五位法国现实主义小说家(司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左拉以及普鲁斯特——你没看错)为题,从提出构想到最后完成历经二十五年,列文认为“文学是一种规制”——在观念与事件之间存在辩证影响,挪揄只注重研究文学形式和结构的语气是“美学式的调情”。

当年,列文把萨义德研究康拉德的博士论文推荐给哈佛大学出版社,继而因目睹学生成为介绍法国新理论先驱,深感隔阂。但后来他应该发现这位学生从未真正远离。顺带一提,1979年4月,钱锺书随中国社科院代表团赴美访问,晤见的三位有名的比较文学家里就有列文。

叙述从来都不仅仅是叙述。最臭名昭著的例子即《犹太长老的秘密》的炮制和流传。俄国沙皇的秘密警察搞到一本抨击拿破仑三世的的小册子,并据此炮制出《犹太长老议定书》,散播对犹太人的仇恨。其后很快被译为德、法、英等各种欧洲语言,成为二十世纪上半叶一份经典的反犹文本。与之相关的一系列事件则很快改变了巴勒斯坦的命运。

* * *

1991年9月,萨义德确诊患有白血病,两年后,他再一次郑重考虑接受哈佛大学的聘请,死亡的脚步日益临近,终老剑桥似乎是不错的选择,但最终他仍选择留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在孤独越发侵蚀的纽约。自1947年离开巴勒斯坦,时隔四十五年,他首次能够重返故土,让妻子玛利安姆、女儿娜杰拉和儿子瓦迪看看自己出生的地方。

后殖民理论读手册里,会提到萨义德、霍米·巴巴、斯皮瓦克是后殖民理论的“圣三位一体”;说到殖民时期和后殖民时期的划分,与康纳·克鲁兹·奥布莱恩、匈牙利裔美国历史学家约翰·卢卡奇谈的萨义德坦言“我觉得这个‘后’字加得没什么用”,因为对他来说,那并没有成为过去。



诗中所表达的不只是失望而已,而是绝望(despair)。他将“独怆然而涕下”译为 alone in despair, my tears fall down. 这不无道理,征讨契丹的第二年,陈子昂就以父亲年老体衰为由解官归侍,远离了政坛。

宇文所安在《初唐诗》中提示,第一句“前不见古人”接近欧洲的 ubi sunt 文学, ubi sunt 系拉丁文,意思是“他们去哪里了”(Where are they),以此开篇的中世纪诗歌惯常表现人生短暂的主题。确实,与“天地之悠悠”相比,人生不过白驹过隙。认识到这一无可改变的残酷事实后,人应该怎么做呢?陈子昂曾明确说:“每在山谷,有愿朝臣,常恐没代而不得见也。”(《谏政理书》)长期无法施展政治才能,他感到非常失望,但恐怕并未绝望。据文献记载,他回家侍奉父亲的同时,开始搜集从汉武帝到武则天史料,准备撰写《后史记》,且列出了大纲,只是因为英年早逝而终未完成。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